



多 一 份 留 念

◆ 王人梁

听到江石邻先生离我们远去了，他这一去留给熟悉他的人多了一份思念。我与江老相识二十多年，江老说我俩是忘年交。那时他退休回沪不久，住我家不远，我没事就经常到先生家看他作画，喝茶聊天。后来因延安路高架建设，他家搬迁了，离我家也比较远，但每隔一两个月我总要去看望他一次。江老十分健谈，笑话连连，很是幽默。今见江老无疾而终，想来与他开朗的性格有关。

江石邻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画家，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他喜作大写意，早年随其堂兄江寒汀画工笔、小写意。后在北方工作，受北方的影响，改作大写意。其画气势很大，看他作画，犹如行拳。

江老喜在墙上画画，作画前他总是左手拿装墨的盆，右手握笔，看着墙上的纸，默默构思，突然横涂竖抹，只听到他喉咙里发出哧哧的声音，然后坐在画前细细打量，优哉游哉慢慢补笔。他对我说，吴昌硕曾说“作画应大胆落笔，细心收实”。做人也一样道理，想好该做的事，就应该大胆地去做，做事一定得细心，考虑使事情做得更完美。

结识江石邻先生这么多年，先生也送了我一些书画，面对着那些书画，深感先生那开朗的笑容与那无争之心态，真为我辈师表。先生画画得好，却和他的名声不太相符，我有问过他什么时候该宣传宣传。他谦虚地说：书画的好与坏，不是靠宣传而定的，要叫作品说话，不要做那虚夸的宣传。人要脚踏实地，书画作品也如此。

今想来先生的作品和其为人一样的高品质，令人敬仰，在此深望先生走好。

笔筒是一种最为常见的置笔用具，虽说属于文玩收藏中的“小器”，但由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和集中体现，艺术价值与实用价值兼而有之，因此也成了人们喜爱的收藏品。

笔筒造型多为圆筒形，也有梅花、葵花、六方、四方等器口。材质大多采用瓷、竹、木、漆，也不乏玉石、象牙、水晶、翡翠、端石等质料。笔筒的装饰方法较为繁多，有刻、镂、雕、绘等。明代《长物志》称：“笔筒湘竹、棕榈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

瓷笔筒，分青花、五彩、粉彩、颜色釉等。始于明代嘉靖年间，以青花为主，直口，平底，束腰。康熙时瓷笔筒到达鼎盛，品种丰富，釉色、造型、

惠康君的《海派藏家百影》付梓在即，作为第一位读者的我，认真真地拜读了全书。在领略了百余位海上藏家风采的同时，更引起我的思索：什么是海派收藏。

据史料载，“海派”一词出现于清末的上海《申报》，有位记者将上海滩改良与创新的并富有上海区域特色的京戏，形容为“海派”，在当时应该说是属贬义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当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海派”一词再度兴起时，它的词性已从往昔的贬义转为绝对的褒义，并成为上海特色文化的一个符号，诸如“海派建筑”、“海派饮食”、“海派戏曲”、“海派家具”、“海派盆景”等，“海派收藏”一词也是从那时发轫并走向全国的。这一时期，也正是上海民间收藏历经“文革”浩劫后再次崛起的时候。在时代大潮的风起云涌的背景下，中国首个省市级法人收藏组织——上海市收藏协会，于1986年6月宣告成立。从此，上海的民间收藏活动一路高歌，为引领与推动我国当代的民间收藏活动，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赢得了有口皆



我珍藏着一套1965年版的解放军领章帽徽。两枚领章的材料是大红平绒布，全红色包边盖住背面一幅印有部队代号、姓名和血型的表格的白棉布，是为了佩戴者在战场上受伤昏迷或牺牲后，给抢救的医生或部队等提供最直接最有用的信息。帽徽是用铝合金制成的一颗正面涂大红漆的红五星。

契丹文化神秘而悠远，在不少传奇作品中均有体现，金庸的《天龙八部》中武功超群、义薄云天的萧峰，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胸前的狼文身，证明他源自于神秘的契丹。家喻户晓、满门忠烈的《杨家将》，讲的就是一千多年前，宋朝军队在杨家将率领下与强大的契丹军队激战的故事。大约距今千年左右，契丹族活跃在我国的北方，在中国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

契丹民族不但创造了强大的军事王国，而且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辽寺和辽塔就是其文明程度的体现。至今在黄河以北地区保存下来的古佛寺和佛塔，或建于辽代，或翻修于辽代。它们巍峨雄伟，历经千年风雨依然坚固挺拔，体现出契丹民族当时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张力。笔者曾见到一块辽代银鎏金令牌，高约10厘米，宽约5厘米，重约175克，十分精致，鎏金工艺精湛，纹饰也相当精美，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令牌正面有两个契丹大字，虽然手头资料不足，无法破译出此令牌的确切含义，但从第一个字下面的部分似乎是“命令、条令”的意思。此令牌首端呈如意云头兽首，顶端有方形穿。旁各阴刻一飞翔的凤凰纹饰，两面开光，银牌用料上乘，做工精细，加之有契丹文字，为研究鉴赏契丹文化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从此令牌上可以看出契丹精

笔筒收藏亦风雅

◆ 流云

画意笔法、题字最为讲究。瓷笔筒品相和釉色是收藏者关注的重点，烧造工艺越难价值就越高。

竹笔筒，目前最早的是明正德、嘉靖年间朱松邻制松鹤纹笔筒，采用的是圆雕竹刻工艺，刀法深峻，立意古雅。收藏竹笔筒主要看是否为名家之作，然后看其时代风格，最后看款式与雕工。竹制笔筒随着时间与环境温湿度变化，表皮会起皱不光整，所以不要一味迷信名款。

木笔筒，主要材质有黄花梨、紫檀、鸡翅木等，以紫檀木、黄花梨木、沉香木等为贵。明代木雕笔筒

民间收藏 / 国家艺术杂志

新民晚报



简朴大方、花纹疏密有致；清代则纹饰繁缛、雕刻精细，借鉴了牙雕、竹雕等技巧。鉴别木笔筒要注意雕工刀法、工艺水平、年代早晚和时代背景。

漆笔筒，它的收藏价值在于笔筒制作工匠的名气，纹饰是原创还是仿作。其中镶嵌百宝的，还要看是否完整，有无后镶添补痕迹，原作无损品相佳则价高。象牙、玉质笔筒，玉质笔筒多

见于清代，以白玉笔筒价值最高。牙、玉笔筒鉴定方法与鉴定玉器、牙雕的方法相似，也可借鉴竹木雕的鉴定方法，按时代风格，表面包浆，雕工技艺依次鉴定。

为海派藏家塑像

◆ 吴少华

碑的声誉。这一切，我们都能从惠康君《海派藏家百影》中，聆听到海派收藏的前进步步声。

再溯源，海派收藏，作为独树一帜的收藏文化，它的起源历史更早。当1843年上海开埠时，由于它的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西风东渐，这里成为了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的大码头，也成为了民间收藏的重镇。我曾读到过《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的史料，说的是公元1862年6月2日（即同治元年）一艘日本邮轮“千岁丸”来上海访问的见闻。《集成》的第一卷中，随访的日本专业画家纳富介次郎有这样的表述：“上海是各国洋人通商贸易的口岸城市，不过只有书画和文房洋人不感兴趣，所以他们对这类商贾漠不关心。清国人听说皇邦的人很珍视书画，每天带来很多书籍、轴画、挂幅、古器等，一个劲地推销。”从这段描写中让我们得知，上海在开埠仅仅20年后，就已经成为中外收藏交易与交流的热土。至清末，这种民间收藏活动得

到了更大的发展。有竹枝词写道：“寻常巷陌藏珍宝，半壁江山在申城”，上海赢得了全国收藏“半壁江山”美誉的出典，就始于此。至民国时，上海滩又出现了一位名垂史册的收藏家，他就是钱化佛。此公原为辛亥革命上海光复时的功臣，受到孙中山的嘉奖，但他功成身退，在点染丹青的同时，致力于收藏，并倡导了“人弃我藏”的集藏理念。在此理念的推动下，他开创了火花、烟标、门券、戏单，甚至讣告的收藏，将昔日的官贾、士大夫的收藏，演绎成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大众文化活动。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向神州大地的时候，上海的民间收藏家们，一如他们的前辈，将对历史文化、理想情操，以及人生追求，倾注于他们的收藏实践中，将视野拓展到更高的领域，将收藏的理念推向更高的创新层面，取得了令国人瞩目的成就。例如已故钟表收藏家王安坚开创了我国民间博物馆之先河，又例如已故算具收藏家陈宝

定最早提出创立“收藏学”，再例如将收藏与制作相结合再创新辉煌的京剧戏服收藏家包毓蓉、紫砂收藏家许四海、古船模收藏家徐滨杰等。在这样的氛围下，上海的民间收藏在上海市收藏协会的大旗下，民间收藏的大军势不可挡，不仅重振了海派收藏雄风，更创造了新的辉煌。

海派收藏重新崛起已经30年了，一批为上海民间收藏作出重要贡献的老藏家已相继与我们远去，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收藏界。在此形势下，惠康君的《海派藏家百影》问世了，这是他历时数年的交流、采访而集聚起来的结晶，并数易其稿，是他以一位文化人的视角而采撷的硕果，虽说不免有挂一漏万的遗憾，但从方位性与代表性的角度看，应该讲是较全面地反映了当代海派藏家的整体概貌与风采。该书还是首部系统介绍当代海派藏家的专著，值得志贺。

愿海派收藏文化与时俱进，发扬光大！

是为序。
（本文为《海派藏家百影》的序言）

出征前寄出的领章帽徽

◆ 马蒋荣

顶军帽和帽徽都是假的。

1979年2月下旬南方边境自卫反击战开始不久，我意外收到了一只在南京附近驻地某野战军工兵连当司务长的弟弟托邮局寄给我的一个小包裹。拆开一看，居然是一顶军帽和这套领章帽徽，中间还夹着一封信。打开信一看，顿时让我热血沸腾，原来我弟弟他们部队已经接到上级要求他们立即开赴自卫反击战线参加战斗的命令。他和连队的全体战士都写了决心书，决心为捍卫祖国的领土完整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权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直至生命！他在信中要我放心，

到了战场上，他一定不会给我们马家人丢脸的！同时他说本来想在复员或者转业后再送我的这几件纪念品，为预防万一，现在只能提前寄给我了！他还告诉我说他有另一封信同时寄给了在绍兴家乡的爸妈小哥小妹了。因为明天就要出征了，所以让我不必回信！

后来我弟弟的部队在边境集结后，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并没有开上前线。几年后，弟弟转业了，如今已是一名在浙江宁波工作的正处级国家干部。

现在，35年前弟弟送我的这套领章帽徽，已经成了我的珍藏。

辽代银鎏金契丹文令牌

◆ 刘英杰



湛的金银器文化，契丹金银器制作工艺继承了唐和五代传统技法，吸收了中原文化、西方文化和周邻民族的文化，并与本民族的传统风格融合一体，形成了新的特色。制作工艺多采用钣金、浇铸、焊接、捶揲、錾花、鎏金、镶嵌等盛行于唐和五代的传统技法，根据契丹族的游牧生活习俗，设计和制作所需要的各种器形，装饰图案多模仿唐代

流行的团花格式，以龙、凤、鹿、鱼、宝相、牡丹、忍冬、联珠与缠枝花卉等纹饰为主。如赤峰市

郊窖藏的辽代鎏金錾花银鸡冠壶，腹部篆刻的鹿纹形像，姿态即与唐代的金花鹿纹银盘的表现手法相同，而器物造型则仿照游牧民族所使用的皮囊壶形制作。

契丹金银器是中国古代金银器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契丹贵族的奢华生活，也反映了契丹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外域文化之间的交融。契丹金银器工艺美术特色，是与悠远的草原民族传统和生活习俗紧密相关的。契丹金银工艺继承了唐代传统，又受到了来自波斯，以及地中海等地文化的影响，并根据本民族的生活习性而创造了极富民族特征的金银工艺，是我国北方大草原上古代金银器文明的鼎盛时期。